

独具特色的塔形窟——响堂山石窟

山东 唐仲明



北响堂北洞主室周壁塔形龕

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境内，一般将地域位置邻近、开凿时间相继的鼓山西麓北响堂石窟、鼓山南麓南响堂石窟以及鼓山东麓的水浴寺石窟（又称小响堂石窟）三处石窟统称为响堂山石窟。

北响堂石窟由三座北朝（386-589）晚期的大窟，亦即俗称的“三佛洞”和四座晚期小型洞窟组成。这三座大洞开凿在南北向的崖壁上，坐东面西，自北向南依次排列，因此又被称为“北洞”、“中洞”、“南洞”。

其中北洞规模最大，洞窟主室长、宽、高均为12米，造像体量也很庞大，故称为“大佛洞”。此窟为中心柱窟，柱后与山体相连。中心柱三壁开帐形大龕，龕内均置一佛二菩萨。龕上及两侧装饰帐形帷幕、山花蕉叶、宝珠纹等。帐柱下有神兽承托。主室周壁开塔形龕16个。整个佛龕表现为浅浮雕覆钵塔形，覆钵上有三叉刹柱，柱头饰火焰宝珠，覆钵前亦饰三火焰宝珠。塔身部分开一圆楣圆拱龕，楣下吊帐形纹，龕内像已不

存。龕下有束腰叠涩须弥座，座两侧有二有翼神兽承托仰莲柱础。

南洞为方形佛殿窟，在窟内主室前壁和前廊处壁面上刻有《维摩诘经》一部、《胜鬘经》一部、《孝经》一部、《弥勒成佛经》一部，因之得名“刻经洞”。窟内为三壁三龕，龕为帐形龕，内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缘觉七身像，龕下壶门内雕刻神王像。窟顶雕莲花。窟外右侧崖面上有唐邕刻经碑。碑文曰：“眷言法宝是所归依，以为缣缃有坏，简策非久，金牒难求，皮纸易灭。于是发七处之印，开七宝之函，访莲花之书，命银钩之迹，一音所说，尽勒名山。”这些文字清楚地点明刻经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存和弘扬佛法。

南响堂石窟由七座北齐（550-577）时期洞窟组成，在崖壁上呈上下两层排列，下层二窟、上层五窟。下层自南向北依次编号1-2号窟，上层编为3-7号窟。

下层第1、2窟规模较大，形制相近，为一组双窟。二窟均为中心柱窟，前后室结构，前室后壁为四柱三开间式仿木结构，柱均为八角束腰仰覆莲柱、贴壁。柱头上有仿木出两跳的斗拱结构。明间为窟门，暗间为二力士大龕。力士龕上部二明窗，窟门上部一圆拱大龕。主室周壁均为左右壁5龕，后壁甬道两侧各1龕的布局，即主室周壁为12大龕布置，龕内均置一佛二菩萨。在主室前壁窟门上方、明窗左右外侧及与之相对的中心柱最上方都布置有浮雕图像，如净土变、

佛传等等。第1窟中心柱正壁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，左右壁为一佛二菩萨三身像。第2窟仅中心柱正壁开一大龕，内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（现已残无）。第1窟主室前壁和右壁刻华严经的《如来名号品》、《四谛品》等。第2窟主室前壁左侧刻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甬道后壁刻《般若经》。

第5窟是整个响堂石窟中规模最小的石窟，宽和进深都不足两米，但雕刻精细。窟外立面亦是四柱三开间结构，八角柱、蹲狮柱础与柱顶窟楣均为圆雕，形成前廊，与第1、2窟的贴壁窟柱不同。主室为方形三壁三龕窟，上为莲花飞天藻井，地面浮雕双层仰莲花纹。此纹饰应为模仿室内地毯，上承龙门宾阳三洞的地面浮雕莲纹，凸现华丽高贵，是响堂仅见的一例。三壁大龕均为帐形龕，内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，龕下壶门内雕博山炉及神王。前壁门上有一帐形小龕，内刻涅槃像。此类窟门上布置涅槃像龕是响堂石窟仅见的一例。

第7窟是整个响堂塔形窟保存较完好的一窟，可看清塔形窟面貌：下为四柱三开间仿木结构，中间是石雕仿木檐，上为覆钵塔和金翅鸟，塔前两侧为山花蕉叶、正中摩尼宝珠。四柱与后面的窟壁构成小的通透式前廊结构。洞窟为方形三壁三龕窟，主室顶为莲花飞天藻井。主室正左右三壁开大龕，均为阙形帐龕。龕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。龕下壶门内雕博山炉和神王像。窟内壁面其余空间满雕千佛。

水浴寺石窟有一座北齐石窟（西侧）和一座宋代石窟



北响堂南洞外立面

（东侧）。西窟外立面为塔形窟，上为覆钵顶，下为仿木结构四柱三开间。窟内为中心柱窟，中心柱三壁开帐形大龕，均置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身像。主室前壁两侧浮雕僧俗礼佛



北响堂中洞窟门甬道右侧菩萨



北响堂中洞主室中心柱正壁大龕右菩萨



南响堂第7窟右侧力士



北响堂南洞主室窟顶

图，左右壁各开一盃顶帐形龕，内雕一佛二菩萨三身像。

从现存的题记、龕窟形制、造像样式等来推断，响堂山石窟应该是北朝晚期，也就是东魏北齐（534-577）时期由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发愿出资，集国家之力开凿的一处大型石窟寺，或者说是皇家石窟。它集中体现了东魏北齐石窟寺的典型特征：如塔形窟和塔形龕、窟外立面逼真的仿木结构，头大、肩宽，整体表现为上大下小的造像，以及造像身上较薄、较浅的衣饰，腿部开始出现横向的圆弧状衣纹等。

在诸多响堂山石窟所创制的新风中，塔形窟是其中最具特色的特征之一。塔形窟，就是在整个石窟的外立面上分上下两部分，表现出一座佛塔的形象。上部，以半圆形的覆钵为主体，覆钵前面一般还有山花蕉叶、摩尼宝珠等。覆钵之上为塔刹，刹两侧有的还有塔幡。覆钵之下则为仿木结构，一般由门（廊）柱、斗拱、窟檐（瓦垄）等组成，门（廊）柱有两根或四根，柱础为蹲狮础，柱身为八楞束腰柱，柱头则饰有火焰宝珠。在下部形成明间为窟门，暗间为窟门两侧力士大龕的布局。这种外立面为塔形布局方式，在响堂石窟中常见，共有6窟，占全部响堂北齐洞窟（11窟）的一半以上。塔形窟的出现，说明北朝晚期佛塔信仰格外兴盛。

其实，不仅在中国石窟中表现

塔的形象，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石窟中也有很多佛塔，一般称之为塔庙窟。不过，印度石窟中的佛塔与中国石窟中佛塔的位置及形制都有所不同。印度石窟中的佛塔多布置在石窟后部，下有低矮的塔基，塔身是巨大的覆钵丘，顶部有塔刹，刹顶不与窟顶相连，这类佛塔是对印度佛塔的真实再现。而中国的塔庙窟，一般统称为中心柱窟，塔柱多布置在石窟中心。在新疆和河西地区，因当地多砂岩石质的具体情况，这种布局除宗教考虑外还兼有建筑结构上的支撑和强化功能。从中心柱（塔柱）本身的形制来看，均与窟顶相连，柱（塔）身正壁开龕置像，发展到后期，柱（塔）身三壁或者四壁均开龕，并且从一层发展到多层。这种变化形式与印度佛塔传入中国后，日益汉化，产生楼阁式塔的过程是同步的。

响堂山石窟有五座为中心柱窟，即北响堂石窟北洞和中洞，南响堂石窟第1、2窟和水浴寺石窟西窟。其中三座更是兼具窟内中心塔柱与窟外塔形窟的二重表达，堪称中心柱窟和佛塔崇拜的终极表现形式。此后中原北方的石窟中再难觅中心柱窟的身影。

佛塔及佛塔崇拜，早在佛教传入中国前后即已随之传入中土，并广泛出现在地面佛寺及石窟寺院中。而

在窟内外反复模拟、再现佛塔的塔形窟，何以这样集中出现在北朝晚期？

佛塔，通俗地讲，就是埋葬有释迦牟尼佛舍利的坟墓。随着佛教的发展与佛经的宣传，塔变成一种纪念物，成为纪念先哲的一种可视形式。塔成为最高地位和等级稳定的象征。

由于塔具有上述含义，因而受到了古代帝王的极大推崇。他们期望死后仍能享受尘世的最高权力、维持现有地位并保持国家稳定。作为皇家纪念物，塔代表了转轮圣王（最高统治者）统治区域之完整。换句话说，由于北齐的帝王们想做转轮圣王，所以他们才会供养、开凿塔形窟。

北齐诸帝做到崇信佛教，但他们还想通过做转轮圣王得到更多。北齐诸帝试图通过建塔上应佛法，乞求永生及国祚永隆；下喻万民，使百姓驯服，从而达到世代为王、永享太平的愿望，且死后葬于七宝塔中，继续享受万民的礼拜与供养。

虽然这种梦想注定不可能实现，但塔形窟的出现却在整个中国石窟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特别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北朝时期的佛塔大多都湮没不存，我们只有通过响堂石窟中的这些模拟佛塔，和那些细腻的石雕仿木结构来重现当年那梵呗声声、铃铎回荡的佛国世界了。



南响堂第3窟塔形特写